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黃克武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黃克武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黃克武主編。-- 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民91
面；公分

ISBN 957-671-869-4(精裝)。-- ISBN 957-671-870-8(平裝)

1. 漢學 — 論文, 講詞等

030.7

91012188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主編：黃克武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印刷者：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展售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 886-2-2789-8208 F: 886-2-2786-1675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
T: 852-2609-6508 F: 852-2603-7355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定價：平裝 新臺幣 260 元
精裝 新臺幣 320 元
初版：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GPN: 1009101984 ISBN 957-671-869-4(精裝)

GPN: 1009101983 ISBN 957-671-870-8(平裝)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為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為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為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

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王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啓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地工作,更

是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民國90年12月

編者序

本書收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中兩個分組的論文，一為「政權與社會力量」，一為「思想與社會」。兩者結合而成本書之主題：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全書共收有論文七篇，均環繞著中國歷史上時代思潮、個人意識與社會、政治發展的交錯關係。在時間斷限上，最早的一篇是廖伯源談漢代「新」的觀念與年號創制之原因，最晚的兩篇則分別為墨子刻討論當代大陸思想狀況，與周惠民分析歷史教育與國家意識之關係，並檢討海峽兩岸的歷史教育。其他的四篇則分別檢討南宋、清代中葉、清末民初與二十世紀，有關葉適、章學誠、嚴復等思想家的生平、思想，以及上海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的來龍去脈。

廖伯源的文章探析漢人對「新」的看法。他認為漢人喜言「新」，在學術方面，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劉向編輯的《新序》；桓譚又有《新論》等書，均以新為書名。在政治方面，如王莽篡漢，以「新」為國號，劉聖公即位，其年號訂為「更始」，均象徵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作者以為這些觀念或多或少可以從漢代經學思想如「天人感應」、「革命易代」、「受命」等觀念之中尋其端倪。繼承此一思路，作者又對中國歷史上「年號」的來源作一考察。文中指出漢武帝創造「年號」，以佳名美字來紀年，也帶有更始、求新之意，與當時喜言「新」的想法有密切的關係。

Peter Bol 的論文詳析南宋經世派士人改革理念之背景，一方面上溯唐宋變革、北宋變法，檢討其對經世派士人之影響，另一方面則從葉適的經世思想，檢討他對國家、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將領與士

紳的角色與定位，以及對於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等問題的看法。作者的文章對於南宋經世派與道學派等兩大派的士人，針對「國家」的重新定位與解釋，有很深入的討論。

汪榮祖的作品是有關清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議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作者的主旨在於肯定錢鍾書所謂「六經皆史說」乃老生常談，章學誠所言並未超出前人藩籬之見解。作者考察諸家（包括余英時在內）所揭示章氏創見之所在，認為章氏為其時代所限，不可能有以史抗經、以史代經，或視史為史料等超時代之創見，今人不免以新時代的見識強加之於古人之上。

黃克武的文章處理晚清翻譯大家嚴復。作者以嚴復的婚姻生活，以及與女學生呂碧城和甥女何紉蘭的交往，來一窺嚴復的異性情緣，並探討此一私人的情感世界對他思索公共議題的影響。該文指出嚴復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是非常傳統的。嚴復返國之後，官場失意、考試受挫，加上家庭生活不睦，使他染上鴉片煙癮，後來又因為病痛，持續吸食鴉片長達三十餘年。這些經驗使他瞭解到中國在施行改革時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尤其是早婚、鴉片、八股文等，而他戒煙失敗，尤其使他體認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嚴復與何紉蘭、呂碧城的過從，則使他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由於他的性格、生活經驗，以及對「國情」的考量，他一直反對婚姻自由，也不提倡一夫一妻制。對於儒家的倫理道德如恕道、忠孝、節義，「女必貞，男必勇」等則堅守不移。他又醉心道家思想，肯定宗教經驗。總之，他對科學、民主等西方現代文化的追尋是奠基於儒家倫理與傳統宗教情操之上。這種中西、新舊的交雜一方面顯示嚴復內心的矛盾、徬徨，另一方面也使他走出一條獨特的「中間路線」，他既批評固守傳統而不知變通，又反對激烈反傳統的革命理念。

石川禎浩考察一度廣為流傳、被當作「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野蠻統治之象徵」的上海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告示牌一事。作者認為告示牌的正確字句如何、規定的變遷如何、以及中國人究竟能否入內從事休閒活動等一系列問題，尚未得到充分的解決。本文首先澄清「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傳聞的由來，並根據當時的原始材料指出：一、有一段時間，公園告示牌上確實有過分別限制中國人和狗入園的兩條規定，一般說法所想像的那種兩者一起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則從未出現；二、1928年公園正式向中國人開放以前，進入外灘公園的中國人，包括部分進步革命人士在內，為數已不少。同時，本文通過對這一問題的透視，揭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的互相矛盾的批判認識和該塊告示牌所暗示的近代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再者，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釐清了日本人與黃浦公園的關係，這是以往學者所忽略的一個課題。

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研究當代大陸在過去 20 餘年所發生的思想變遷。根據墨子刻，此一過程可謂從一個轉化性、無限制的政治核心 (transformative, un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 轉變為調適性、有限制的政治核心 (accommodative, 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在此一過程之中，思想市場出現了四大思潮：儒家人文主義、自由主義、中國的馬克斯主義、新保守主義。這四大思潮雖有分歧的發展與不同的理念，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預設。尤其重要的預設是「樂觀主義的認識論」、對政治可行性的樂觀、認為國家在道德上是可以改正向善的觀念，以及認為菁英份子可以以大公無私的理念處理眾人之事。這些思想潮流可否影響政治核心的發展呢？在考慮此一問題時，不但要注意四大思潮對一些關鍵議題的看法，也不能忽略這些思潮所共有的預設。作者強調對於這些預設的探索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追尋「批判意識」的重要部分。同時，這些預設將影響到中國未來政治的走向。

周惠民文章的主旨在申論歷史教育對於國家意識養成之重要性。全文以德國以及當前兩岸歷史教育為例。尤其重要的是作者詳述德國

歷史教育發展的過程，這是國內學者在討論此一課題時，所較少觸及的。作者指出西歐地區自實行封建制度以後，領主在其領域內自成一個統，地方意識一直抬頭，大一統概念或民族意識相對地不受重視。拿破崙戰爭期間，德意志民族才對民族概念有較深刻之體認。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德意志民族逐漸有建立民族國家的呼聲。如何創造一個共同的民族認同感，是鼓吹民族主義者的重要課題。歷史因而成爲許多思想家的工具，自蘭克(L. v. Ranke)、特來區克(H. v. Treitschke)以降，普魯士史家所主張的歷史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以建立共同歷史意識爲民族意識的先導，認爲共同的歷史感可以成爲民族統一的基礎。本文以上述歷史教育與民族、國家意識的關係爲基礎，進而討論海峽兩岸的歷史教育，檢驗教育乃至行政當局所欲「塑造」的國家意識爲何？是否達成此目標？教育過程中，又產生哪一些問題？作者強調目前台灣實施的歷史教育，既無關乎國家意識，也沒有清楚的世界觀，歷史教育甚難與國家意識連結。此一狀況與前述西方地區歷史教育實施的經驗並不盡符合，實有檢討之必要。

總之，本論文集的各篇論文環繞著中國歷史上思想意識與社會、政治發展的相互關係，對於我們思索意識與時代之關連、知識份子之角色，乃至海峽兩岸未來之走向等課題，均有所助益，希望讀者能細心品味。

最後在本論集的編輯過程之中承蒙本所出版小組召集人魏秀梅小姐，以及林桂如小姐與李育憲先生的多方協助，在此特地向他們表示感謝之意。

黃克武 謹誌

民國 91 年 5 月 1 日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ii
編者序	黃克武	vii
說新——兼論年號創製之原因	廖伯源	1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in Southern Song —Some Implications of Ye Shi’s Statecraft Learning	Peter K. Bol	33
章實齋六經皆史說再議	汪榮祖	65
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	黃克武	97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	石川禎浩	137
China’s Current Ideological Marketplac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ly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omas A. Metzger	157
歷史教育與國家意識	周惠民	191
總書名表		213

《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 1-31

說新——兼論年號創製之原因

廖伯源*

一

西漢人喜言「新」，好說「更始」。陸賈作書，名之曰《新語》；賈誼撰述《新書》¹；劉向編輯《新序》；桓譚又有《新論》。² 及王莽篡漢，以「新」為國號。劉聖公即位，其年號為「更始」。上述諸書為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5月12日初稿。5月22日二稿。承李啓文、何漢威、朱鴻林、洪金富、邢義田諸兄指正，6月12日三稿。審查意見提示二條資料，用以增改，2001年4月23日四稿。

¹ 本文所引正史，皆引中華書局點校本。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30/1726)《漢書·賈誼傳》贊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48/2265)史文不言賈誼之著作名為「新書」。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謂「新唐志始題為新書。」(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民國34年初版)《蕭公權全集之四》，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339。是賈誼之著作本無專名，史書僅稱作賈誼書，至北宋始稱作「新書」。然其所以見稱新書，亦大好玩味。

² 《後漢書·桓譚傳》曰：「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28上/961)按譚於西漢哀帝時為郎，「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光武時為議郎給事中，以批評讖緯得罪，「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28上/955-961)是譚傳雖入《後漢書》，其人實與劉歆、楊雄同輩，其學問在西漢時已有所成就。

以「新」爲名？王莽爲何以「新」爲國號？今試釋之，以探討「新」在西漢人之思想中，有何特殊之意義，並說年號創製之原因。

二

陸賈《新語》之得名，可見《史記·陸賈列傳》：

（陸賈以《詩》《書》說高祖，並謂馬上得天下，不得馬上治之，高祖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97 / 2699）

陸賈之著作名爲「新語」，是其自題，抑高祖賜號，史文疏簡，不能確定。要者，其書爲何以「新」名之？王利器撰《新語校注·前言》引王充《論衡·案書篇》曰：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³

《新語》屬儒家，⁴ 嚴可均撰《〈新語〉敘》曰：

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⁵

³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1986），頁7。參見《論衡·案書篇》，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論衡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636-1637。

⁴ 《漢書·藝文志》：歸「陸賈二十三篇」入儒家。30 / 1726。

⁵ 前引《新語校注》附錄：嚴可均《〈新語〉敘》，頁215。

上二引文雖不言陸賈《新語》為何以新為名，然皆對《新語》評價甚高：侷於「古聖之言」，開出賈誼、董仲舒之學。則可謂《新語》發揮儒家之義，立新說而成一家之言。名之為「新語」，以謂其說「新」。或可作一解。⁶

賈誼《新書》，其精華多見《漢書·賈誼傳》所引及《史》、《漢》所引〈過秦論〉，⁷《四庫全書提要》言之甚詳，⁸今欲言賈誼之思想，據《史》、《漢》所引賈生之言可也。賈誼書亦屬儒家之著作，⁹賈誼書與陸賈《新語》比較，《新語》多儒家之空言，¹⁰賈誼書則多對漢初實際政治問題之議論及解決之辦法。¹¹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¹²謂賈誼論政，為對亡秦政治之反動。秦政尊君專制，賈誼主貴民，上接孟子民為貴之思想，雖非原創，然於法家尊君思想大行百年之後，賈誼重申貴民之義，於時人耳目，自有其新意。

6 邢義田兄指正拙文，謂「儒家之義，於劉邦君臣具『新』意。此等秦吏原本所知者多律令刀筆之事，於儒家仁義之旨，所知甚少。」及讀陸賈所奏儒家之言，多前所未聞，因名陸賈之著作為《新語》。此亦可作一說。

7 《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所引，(6/276-284)《史記·陳涉世家》褚先生曰所引(注以為當是司馬遷所引，不贅。48/1961-1965)《漢書·陳勝項籍傳》贊所引。(31/1820-1826)

8 《四庫全書提要》曰：「《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稿耳…』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提要》因此謂《新書》為後人取《漢書》所引賈生之言，「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沓亂無條理。」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則謂班固取賈誼書，「翦裁鑄鑄，煞費苦心，」收其精華入《漢書》。論辨甚繁，不贅。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上海：商務印書館，序於1937年7月)子一，頁14-22(327-344)。

9 《漢書·藝文志》：歸「賈誼五十八篇」入儒家。30/1726。

10 《新語》偏重於說義理，多空言。參見前引王利器，《新語校注》。

11 參見《漢書·賈誼傳》(48/2221-2265)及賈誼《新書》，《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重印)，第57冊。

12 此下所論賈誼之思想，參見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09-313。

秦用苛法而赭衣半天下，賈誼以為治天下應以禮義導民，《漢書·賈誼傳》載誼於文帝時上疏陳政事曰：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禍幾及身，子孫誅絕。（48/2253）

蓋對秦嚴刑苛法之反動，欲漢代之以仁義禮樂之新政。¹³

又「賈生深病秦人破壞家庭倫理之舉…欲矯正其俗，」申事君長如事父兄，慈民如愛子之義。¹⁴

賈誼又主「明君臣之分，又欲重整周代階級之組織。」「於階級蕩平之後意圖使其復現，此其矯正亡秦政治之又一表示」。¹⁵

西漢人莫不醜詆亡秦，此「正足窺見亡秦政治所激起思想反動之深切」。¹⁶ 賈誼生於漢初，處於此反秦思潮之前鋒，其著作反對秦政，倡議棄秦之舊而立漢之新。《漢書·賈誼傳》曰：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48/2222）

賈誼書於漢世是否已名為「新書」，無考；而其於後世以「新書」之名流傳，原因或在於其內容倡言立漢之新政。

13 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12。

14 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12-313。

15 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13。

16 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11。

《新序》、《說苑》原已有其書，蓋採集先秦至漢之故事，分類而成。劉向校書宮中，刪削補充而奏上。故《新序》、《說苑》為劉向所重新編輯者。¹⁷《漢書·藝文志》謂「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六十七篇，包含《新序》、《說苑》。¹⁸序，謂序次、編次；張心澂《偽書通考》謂「《漢志》云：『某某所序』即今所謂『某某編輯』。」¹⁹《新序》為劉向「就舊書所重新編次」。²⁰故名之曰「新序」，其新字並無其他特別意義。²¹羅根澤且謂今之《說苑》，即劉向新增補者，原名《新苑》。²²其「新」字亦與《新序》之「新」字同義。

桓譚《新論》之名，蓋倣陸賈之《新語》。蕭公權曰：「桓譚倣陸賈《新語》著《新論》二十九篇，上奏光武。」²³陸賈說高祖不得於馬上治天下，書治平之術上奏，號曰《新語》。二百年後，桓譚逢光武光

17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曰：「《新序》、《說苑》則雖本有其書，其文亦悉采之傳記。然向既除其兩書之復重者…又刪去其淺薄不中義理者…蓋已自以義法別擇之，使之合於六經之義。況本傳云：『采傳記行事。』《說苑·敘》云：『更以造新事。』則向又已有所增益於其間。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以成儒者一家之言。故雖采自古書，仍不能不謂為劉向所序。」（前引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347-348。）

18 《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下有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30/1727）

19 張心澂，《偽書通考》（商務印書館，缺其他出版資料），下冊，頁638。

20 參見王仁祿，〈今傳西漢諸子遺籍考〉，《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1968），頁34。

21 《新序疏證》十卷：計「雜事」五卷，「刺奢」、「節士」、「義勇」各一卷，「善謀」二卷。〔趙善詒疏證，《新序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341頁。〕各卷標題如此，其內容大致可知，並無特別「新」意。

22 羅根澤〈《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曰：「《說苑》〈敘錄〉又言：『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則劉向實就舊有《說苑》，增造新事，以為《新苑》。考今《說苑》亦二十篇，漢志劉向所序書有《說苑》，無《新苑》。向本傳言：『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則自漢志所載，以至今行世之《說苑》，蓋即劉向增補之《新苑》。」（羅根澤，〈《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初刊於1930年《圖書館學季刊》第4卷第1期〕，《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541。又參見前引張心澂，《偽書通考》下冊，頁693）

23 前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331-332。

復漢家天下，欲效法陸賈為王者師，其書亦倣陸賈《新語》之名，名之曰《新論》。

王莽篡漢，以「新」為國號，或以為王莽前封新都侯，乃採新都之新字。²⁴ 按此可為一說。另一說為「新」乃美號，《白虎通義》曰：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²⁵

楊聯陞陳述古今中外各家之說法，以為就現有之證據言，地名說與美號說二者，皆有可能，不可偏廢。²⁶ 楊氏之說平實可從。

綜上所述，《新語》、《新書》、《新序》、《新論》四書以新為名，《新

24 《論衡·正說篇》曰：「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論衡注釋》，頁1603）又趙翼《廿二史劄記》有「元建國號始用文義」條：「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68年台二版〕，29/22a）上述二條資料，皆據楊聯陞之書評查閱。楊聯陞之書評，乃評 Homer H. Dubs《漢書》英譯本第三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9[1956], pp. 435-442）Dubs 在其回應仍堅持新朝之新字來自新都侯，並謂王莽以復古為志，新與「不故」同義，以新舊之新為其國號，為王莽所忌諱。見 Dubs 致 *HJAS* 編者信（*HJAS*, vol.20[1957], pp. 728-729）。

25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68年台一版），頁43-44。此條資料亦據前引楊聯陞之書評查閱。

26 楊聯陞之意見及其陳述除見前引其對 Dubs 英譯《漢書》第三冊之書評外，亦見其對 Dubs 致 *HJAS* 編輯信之答覆（*HJAS* vol.20[1957], pp. 730-732）。1956年4月及5月，胡適與楊聯陞通信各七、八通，討論王莽國號新是出自地名，抑是美號。二人同意二說皆有可能，不可偏廢。見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272-299。